

# 马克思早期探寻“物质利益难题”之路 及其对国家治理实践的启示

徐苗

上海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上海 200444

**摘要:** 马克思曾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其在《莱茵报》时期遭遇和求解“物质利益难题”的历史进程予以简要概述,这一概述隐匿着马克思为求解“难题”而展开自身思想体系建构之路的价值意向。《莱茵报》时期,秉持人民理性立场的马克思在求解现实物质利益问题的进程中遭遇“难题”,这一“难题”内蕴双重理论意涵,既在世界观领域指向人民理性与物质利益之间的真正关系为何,又在经济生活向度指涉何以有效消解社会贫困问题。从马克思整体的思想发展历程来看,现实物质利益问题演变为一种“难题”,是马克思早期思想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事件,其在遭遇“难题”期间形塑了诸多富有国家治理价值的建设性观点。

**关键词:** 马克思;人民理性;物质利益难题;国家治理,中国式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 B0-0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12186/2025.01.001

**文章编号:** 2096-9864(2025)01-0001-08

马克思曾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以下简称《序言》)中明确指出,其在《莱茵报》时期“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sup>[1]</sup>,学界将其统一概称为“物质利益难题”(以下简称“难题”)。学界围绕马克思何以遭遇“难题”、“难题”的基本内涵及其对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影响等展开了相对丰富的研究。综合审视既有研究成果,发现学界在探讨马克思何以遭遇“难题”时缺乏一种过程性视角的剖析,对“难题”基本内涵的求索偏重于世界观领域而相对忽视其他视角的分析,并且主要集中于马克思思想发展向度探究“难题”及其求解诉求的价值。在批判性承继学界研究成果的前

提下,对马克思视域中的“难题”展开深入探究,有助于综合把握“难题”的理论意涵、强化对于马克思早期思想发展脉络的理解;同时,在当前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背景下,辩证省思“难题”及其求解诉求的历史价值,特别是求索“难题”期间形成的富有国家治理意蕴的建设性观点,对我国当前国家治理实践有重要启示。

## 一、“问题”何以成为“难题”

以林木盗窃、地产析分事件和摩泽尔河沿岸地区农民贫困现状为主要表征的现实物质利益问题演变为“难题”是马克思早期思想发展

收稿日期:2024-10-10

基金项目:教育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20JDSZKZ03);上海大学2023年本科教学改革与研究项目(N50-2023P0017)

作者简介:徐苗(1993—),女,安徽省明光市人,上海大学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进程中的一个重要事件,对其思想发展具有潜移默化且持久的影响。但现实物质利益问题何以能够成为马克思视域中的“难题”?这一提问预设了一个前提条件,即现实物质利益问题的普遍存在,这与德国社会的畸形发展现状紧密相关。在默认这一前提条件的基础上,现实物质利益问题演变成为马克思视域中的“难题”内蕴两个前后相继的必要环节:发现并关注普遍存在的现实物质利益问题,在发现的基础上聚焦求解物质利益问题且求解主体在探索过程中陷入两难境地。

《莱茵报》时期的编辑工作为马克思发现并接触现实物质利益问题提供了便利,在发现的基础上展开求解活动则是促使马克思遭遇“难题”的关键环节,这主要是因为马克思在求解物质利益问题的过程中陷入了两难境地,而求解不了的物质利益问题必将演变成为一种“难题”。更加具体地说,若社会主体在求解某一问题时,始终保有清晰、笃定的答案,问题自然便会消解;若社会主体在求解问题时左右为难、举棋不定,或者面临问题的主体性力量遭到掩蔽,问题必将演化成为一种难题。需要深入思考的是,《莱茵报》时期的马克思为何会对现实物质利益问题展开系统性求解?马克思为何会在系统性求解现实物质利益问题的过程中陷入两难境地?

《莱茵报》时期的马克思之所以会对现实物质利益问题展开系统性求解,其关键性因素是人民理性概念的形成与运用。这一时期,马克思曾发表政论文章,直接提及“人民理性”这一概念,即一个国家如果像古雅典那样把谄媚者、寄生虫和阿谀逢迎之徒当作违背人民理性的人和人民中的丑类来加以惩处,这样的国家就是独立自主的国家<sup>[2]145</sup>,但并未对这一概念展开针对性解释。结合马克思《莱茵报》时期及其

前后阶段的思想发展历程来看,其视域中的“人民理性”是康德“批判理性”与黑格尔“现实理性”的有机融合,这一概念诉诸黑格尔哲学的“思有同一”原则,消解了康德哲学乃至近代西方哲学“观念应有”与“现实实有”之间的矛盾对立,在摒弃黑格尔哲学保守主义弊病的基础上丰富了理性的批判性、现实性和人民性内涵。有学者明确表示,马克思力图实现康德理性批判原则和黑格尔理性现实性要求的有机统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康德和黑格尔彼此补充的理性原则就成为马克思《莱茵报》时期政论的主要灵感源泉<sup>[3]</sup>。概括来说,《莱茵报》时期,马克思视域中的“人民理性”不仅是指人的逻辑思考或判断能力,更加指涉一种内蕴批判性、现实性、人民性和普遍性等特征,整体实现了“思有同一”原则的本原性存在、合理性存在。在这种人民理性概念的影响下,马克思能够秉持批判性的眼光判断现实事物是否合理合法,能够对现实物质利益问题展开系统性的反思,不至于像黑格尔那样将现实物质利益问题视为能够被绝对理性所消解的存在,也不会像青年黑格尔派诸多代表人物那般沉迷于自我意识哲学抽象空洞的理论批判而忽视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现实物质利益问题。但需要注意的是,马克思视域中的“人民理性”初步形成于其遭遇以林木盗窃、地产析分事件和摩泽尔河沿岸地区农民贫困现状等为主要表征的现实物质利益问题之前,并随着马克思物质利益问题求解历程的推进而不断地发展。

马克思为何会在系统性求解现实物质利益问题的过程中陷入两难境地?学界对此存在诸多见解,如指出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尚未深涉政治经济学相关理论,因而难以对现实物质利益问题作出针对性解剖的“知识缺失论”;强调现实物质利益问题对马克思单纯理性世界观

造成了致命性冲击的“冲突对立论”;表示《莱茵报》时期已然形成自己哲学思想的马克思关于现实物质利益问题的认识与诉诸黑格尔哲学分析得出的结论存在偏差,正是这种偏差使得马克思感到为难的“思想独断论”<sup>[4]</sup>。在对马克思为何会陷入两难境地这一困惑的探索上,我们认为“知识缺失论”和“冲突对立论”的分析较为合理。综合来说,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确实缺乏政治经济学领域相关知识、秉持唯心主义人民理性立场的实际状况致使其无法对现实物质利益问题作出专业的剖析,也难以理解在“法的原则”与“林木利益”的现实较量中,利益所得票数为何能够超过法的票数<sup>[2]288</sup>;虽然他本人通过肯定人民理性的正当性、揭示物质利益的非法性,在理论上暂时地解决了“难题”,但其关于人民理性的怀疑之种已然萌生。更加具体地说,马克思本人在构想现实物质利益问题的求解路径时陷入了一种矛盾状态,即马克思在诉诸作为人民理性现实表征的“人民代表制”以求解现实社会问题的同时,又开始反思甚至怀疑人民理性与作为人民理性最高实现的现代国家能否真正代表和维护人民的普遍利益。

《莱茵报》时期,人民理性概念的形成促使马克思能够在发现、关注现实物质利益问题的基础上展开求解;而政治经济学领域相关知识的缺乏,唯心主义的人民理性立场,以及物质利益与人民理性之间的尖锐冲突,则使得马克思在求解现实物质利益问题时陷入一种矛盾状态,这种矛盾状态的存在总体意味着现实物质利益问题演变成了马克思视域中的“难题”。

## 二、“难题”的双重意涵及其关联

《莱茵报》时期,秉持人民理性立场的马克思在求解现实物质利益问题时遭遇了“难题”,

但“难题”的基本内容为何?多数学者将“难题”理解为世界观领域理性精神与物质利益之间的矛盾纠葛,即理性精神支配物质利益的“应有”预想被物质利益左右理性精神的德国社会“现有”境况所取代,而马克思赖以信奉的理性精神及其现实表征,如现代国家、政府当局及其行政机构等却并不能对物质利益问题作出相对科学的解释和回应<sup>[5]</sup>。也有学者诉诸三重维度阐述马克思视域中的“难题”:一是古典自由主义理念、国家的应有本质之价值悬设与客观的经济现实之间产生了脱节;二是谈及林木价值时所产生的诸多困惑;三是国家法律与私人利益之间的矛盾纠缠<sup>[6]</sup>。依循学界关于“难题”内涵的诸多认知进一步思考,我们认为“难题”具有双重理论意涵,既指涉一种世界观领域的疑问——人民理性与物质利益之间的真正关系为何,又指向关涉人民普遍利益的经济问题——何以消除社会贫困。

“难题”在世界观领域指向人民理性与物质利益之间的真正关系为何。世界观领域的“难题”意涵具体包含以下三重困惑:其一,在何谓物质利益问题上,普遍利益与私人利益之间的关系等方面存在认知上的纠结。这一纠结主要表现为马克思对物质利益的理解具有自相矛盾之处,其一方面批判物质利益是“下流的唯物主义”且具有盲目贪婪的本质;另一方面则致力于维护人民群众的物质利益诉求,如要求“真正的法律”以保障贫苦阶级的利益,肯定葡萄种植者和经营者私人利益的合理性等,同时还强调私人的信念和愿望应该用普遍的信念和普遍的愿望来加以衡量<sup>[2]377-378</sup>。在理解物质利益上所存在的矛盾状况,表征着马克思关于物质利益的认知困惑真实存在。其二,马克思在求解现实物质利益问题的进程中,发现了物质利益支配人民理性及其现实表征的客观事

实,这促使他开始思考特权等级私人性的利益诉求或私有财产为何现实支配着整个国家及其行政机构,在“林木利益”和“法的原则”的现实较量中,前者何以能够战胜后者。有学者表示,马克思视域中的“难题”就是“私有财产对理性国家的挑战”<sup>[7]</sup>。不可否认,这一观点切中了“难题”的核心内容所在。其三,鉴于马克思已经初步探明特权等级及其利益诉求对于理性国家的支配作用,其必将反思人民理性是否真实地内蕴于社会历史发展的本原性地位和决定性作用,追问国家制度与行政机构的完善能否切实维护人民普遍利益,省思并探求国家及其行政机构究竟“从何而来”“因何而在”。世界观领域“难题”意涵所内蕴的三重困惑相互关联,在本质上反映出西方哲学史上对本体论问题的追问理路。

“难题”在经济生活向度指涉何以消除社会贫困问题。马克思曾在《序言》中揭露致使其遭遇“难题”的社会事件,即“莱茵省议会关于林木盗窃和地产析分的讨论,当时的莱茵省总督冯·沙培尔先生就摩泽尔农民状况同《莱茵报》展开的官方论战,最后,关于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的辩论”<sup>[1]</sup>。马克思针对以上社会事件的辩论文章主要有《关于林木盗窃的辩论》和《摩泽尔记者的辩护》,其中总体隐匿着一个共同关注点,即贫苦阶级的私有财产权问题或社会贫富分化问题。有学者指出,《莱茵报》时期马克思感到为难的地方其实与一无所有等级的贫困问题相关,其具体表现为贫民具有抽象的所有权,然而实际上却一无所有或者是很少能够占有什么<sup>[8]</sup>。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接触并揭露的农民贫困问题主要是封建专制制度的腐朽、低能和相对低下的生产力水平所催生的社会绝对贫困,这种贫困有别于其一生所重点关注与求解的现代性贫困或资本主义条件下

雇佣劳动者的贫困。虽然《莱茵报》时期封建专制制度下的农民贫困相较于现代性贫困而言,只获得了马克思暂时性和阶段性的观照,但马克思本人却在这一时期萌生出关注并求解社会贫困问题以保障和维护人民普遍利益的现实意向,并且这种现实意向在其后的《德法年鉴》时期进一步深化为人类解放的崇高价值理想。从马克思思想发展的整体进程来看,《莱茵报》时期及之后,何以消除社会贫困问题已然作为一种时代性课题进入马克思的理论视野,并为马克思所重点关注和探讨。

世界观领域人民理性与物质利益之间的真正关系为何、经济生活向度何以消除社会贫困问题共同表征着“难题”的丰富内涵且彼此在求解进程中相互促进。也就是说,“难题”在世界观领域和经济生活向度所指涉的理论意涵各有其关注点,但对人民理性与物质利益之间真正关系的探究直接影响着社会贫困问题的求索,反之亦然。除“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这一表述之外,马克思还在《序言》中使用“苦恼的疑问”这一表达,由此在学界引发了“苦恼的疑问”是什么,其与“难题”之间存在何种关系的争论。秉持“同一论”的学者认为,“难题”与“苦恼的疑问”所指涉的内容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国家政治制度与物质利益的关系问题或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问题就是让马克思“苦恼的疑问”<sup>[9]</sup>;坚持“差异论”的学者表示,“难题”具体是指马克思因缺少对经济问题的研究而难以对涉及物质利益的争论发表意见,“苦恼的疑问”指向物质生活关系在社会历史中具有何种地位与作用<sup>[10]</sup>;倡导“关联论”的学者强调,“难题”是催生马克思产生“苦恼的疑问”的重要因素<sup>[11]</sup>,但这一观点并没有针对“难题”和“苦恼的疑问”的外延内容作出明确判定。推崇“包含论”的学者指出,马克思在

《莱茵报》时期的政治实践中遭遇了包含“物质利益难题”和“共产主义难题”的双重“苦恼的疑问”<sup>[12]</sup>。

事实上,马克思“苦恼的疑问”既包括“难题”,又指向如何评价法兰西思潮与批判性地辨析德国流传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观点等,但“难题”是促使马克思产生“苦恼的疑问”的核心内容,其之后关于“苦恼的疑问”的求解也更多是围绕“难题”的内容展开的。之所以作出这样的判定,主要是因为《莱茵报》时期的马克思对于各种流行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潮的了解相对贫乏,甚至由于德国主要是浸透着封建思想的反动派在传播共产主义思想,这使得马克思采取十分谨慎的态度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实际运动与其理论表征相互区分。可以说,《莱茵报》时期的马克思只是依靠经验认识到在英法是一无所有的等级要求占有中等阶级的一部分财产<sup>[2]293</sup>,认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作为一种思想或理论,其现实性却仍然有待于用客观理性的观点予以进一步的研究和论证,他本人在根本上并没有形成结合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潮来省思社会贫困问题的自觉意识。因而,我们在综合考虑马克思对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潮实际理解状况的前提下,并没有将如何评价法兰西思潮、辨析德国流传的共产主义观点等,与何以消除社会贫困问题一起视作“难题”的核心内容,而是将其视作“苦恼的疑问”的内容。但不可否认的是,法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者对无产阶级贫困化问题的关注,一定程度上吸引了《莱茵报》时期马克思的注意力,这受益于他本人所展开的关于共产主义问题的研究视域。

### 三、遭遇“难题”期间的建设性思考

现实物质利益问题演变为“难题”是马克

思早期思想发展进程中的重要一环,这是基于马克思思想发展视角而判定的“难题”出场之于马克思思想发展的价值。此外,马克思在遭遇“难题”即求解现实物质利益问题的进程中,曾围绕国家治理问题展开解析并形成了诸多建设性观点,这是基于对后世的影响视角而省思的历史价值,应当给予重视并剖析。

“难题”及其求解诉求被马克思予以持续性地关注,且是助推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内在动力。学界在探究“难题”及其求解诉求的历史价值时,主要围绕马克思思想领域的“两个转向”而展开,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学者是列宁。列宁表示:“1842年,马克思在《莱茵报》(科隆)上发表了一些文章……从这些文章可以看出马克思开始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sup>[13]</sup>承接列宁的“两个转向”思想,国内学者大多肯定了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通过剖析“难题”而初步开启了自身思想转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建构之路。例如,有学者指出,《莱茵报》时期关于共产主义的政治争论与对物质利益问题的反思,极大地动摇了马克思的信念,使之开始怀疑、反思黑格尔的国家观,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转向由此获得了真实的起点<sup>[14]</sup>。“转向”呈现的是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动态演进过程,彰显出“难题”及其求解诉求之于马克思思想发展的推动价值;也正是鉴于“转向”这一思想发展动态过程的存在,国内外学者们关于“转向”的程度以及由此衍生的马克思思想性质问题存在诸多争议。争议的焦点集中于已然开启“转向”的马克思思想发展至何种程度,在马克思思想领域是唯心主义和革命民主主义占据主导地位还是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更具优势。整体辨析学界这些争议便能够发现一个共识性认知:在《莱茵报》时期遭遇“难题”期间,马克思思想实

实实在在地出现了变化,这种变化具体到思想领域就是唯物主义因素的强化。可以说,现实物质利益问题演化为“难题”及其催生的求解诉求,促使马克思不断地展开自身思想体系的革新与重构之路,并主要表现为世界观领域唯心主义理性国家观的消解、方法论层面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开启与深化、价值旨趣维度人类解放愿景的确证与践履。

现实物质利益问题演化成为一种“难题”,是马克思早期思想发展中的一个重要事件,对其思想的革新与建构具有促动作用。此外,马克思在求解现实物质利益问题期间,对与国家治理相关的现实问题展开了针对性的剖析,其间形成的诸多建设性观点对处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的国家治理实践,也具有一定的指导价值。

其一,在治理主体上聚焦培养和提升政府官员综合素质。在对国家行政机构中官员所处地位和实际作用存在较为明确认知的前提下,马克思揭露出政府官员的“不作为”和“虚假作为”及其催生社会问题或激化社会矛盾的事实,如政府官员片面肯定新书报检查令而致使人民丧失主体自由、坚决否认自身管理工作的迂腐而致使社会贫困问题愈演愈烈等。马克思所揭示和批驳的政府官员“不作为”和“虚假作为”的社会事实在新时代中国依旧真实存在。习近平总书记曾明确指出,“当前,所谓‘为官不易’、‘为官不为’问题引起社会关注,要深入分析,搞好正面引导,加强责任追究”<sup>[15]</sup>。所谓“为官不为”主要是指党员领导干部在自身职责与权限范围内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导致工作绩效与岗位标准相互脱节,具体表现为岗位工作上的消极怠工、平庸无能,理论学习上的“躺平”“失语”等。从我国高效的反腐实践来看,应对“为官不为”问题一方面需要体制机制

层面的有力约束与保障,另一方面则需要广大党员干部主动强化党性修养和提升综合能力。“为政之要,惟在得人。”党员干部是国家治理活动的主体,其能力和素质直接关系党的执政水平与政府的行政效率。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中,应当创新性地继承重视干部队伍建设的优良传统、夯实干部管理“四梁八柱”的制度框架、多措并举落实干部队伍教育培训工作等,以在总体上提升干部队伍综合素质的基础上聚焦破解“为官不为”问题。

其二,在治理原则上全面贯彻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莱茵报》时期的马克思针对愈益严峻和普遍的社会贫困问题(现实物质利益问题的具体表征之一),直接揭示了存在于普鲁士王国官僚治理体系内部的“现实和管理原则之间的矛盾”<sup>[2]376</sup>,即政府当局本身存在的与政府当局同特权等级勾结谋利的制度性腐朽关系。马克思的这一揭示和批判给予新时代我国国家治理实践一个至关重要的启示:“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这一首要原则。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其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且坚持不断地推进自我革命来保持自身“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先进性;在国家治理实践中,确定一个具有领导地位且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领导主体至关重要,这有益于工作高效有序、协调共促地推进而不致于流于形式、浮于表面。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是历史和人民的必然选择,应当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实践中矢志不渝、坚定地贯彻这一首要原则,并以这一理性化的认知为指导,深刻把握“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切切实实地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等落细、落实至国家治理实践的各个环节和方方面面,统筹处理好党同国家政权、国家法律和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面对“两个大局”交织叠

加的特殊发展境遇,需要秉持初心的中国共产党人团结一致、接续奋斗,在国家治理工作的各个维度贯彻落实党的全面领导,这实际上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战略举措。

其三,在治理机制上注重建构和完善社会公共舆论平台。在国家制度领域,要求新闻出版自由、诉诸自由报刊以在全国范围内宣传贫苦阶级的生活现状,是马克思求解物质利益问题的重要举措之一。在结果层面暂时抛却自由报刊能否切实维护人民普遍利益这一问题不谈,马克思在国家制度创新领域所提出的建构社会公共舆论平台、完善新闻传媒机制的现实性要求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新时代,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中,国家治理总体呈现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和公众参与的共建共治共享式治理格局。但如何让社会公众真实且广泛地参与国家治理活动?最根本的无疑是“加强人民当家作主制度建设”“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健全吸纳民意、汇集民智工作机制”<sup>[16]28</sup>。在现实生活中,如何强化工作机制建设以保障人民群众有渠道发声、有平台传意、有条件说理?一个重要的建设要点便是建构和完善社会公共舆论平台。当前可以说是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互联网+”时代,信息的高度积聚与快速传播、信息受众的普遍化与多元化、社会主体认知意见发表与传播的便捷等已是不争的客观事实,这一事实为国家治理实践更好地积聚人民智识创设了良好条件。党和政府应当积极利用“互联网+”的时代优势,在优化网络空间治理、营造良好网络环境的同时,诉诸微博、微信、抖音等受众广、关注多、流量大、时效快的社交媒体,针对性开辟具体的民生或社会版块来拓宽社情民意的表达渠道,以推动国家治理实践能够更加

广泛地汇民意、惠民生。

其四,在治理目标层面以实现和维护人民普遍利益为指归。马克思在中学时期就立志要为全人类幸福而工作,这一远大理想在《莱茵报》时期更加现实化为致力于实现和维护人民普遍利益,并表征于马克思求解现实物质利益问题的进程中。譬如,马克思为切实维护人民普遍利益而试图通过自由报刊和人民代表制的联动作用,来实现对整个国家制度和行政机构的革新与重构。从应然逻辑和价值规定的层面来看,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领导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其当前致力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目的在于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新时代,我国应然维度实现和保障人民普遍利益的根本指归落到社会生活领域,主要表现为聚力求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面对新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和“两个大局”交织叠加的复杂形势,党和政府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主体应当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着力在实然维度有效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抓好改革、开放和创新这三件大事,主动在变局中把握先机、于变局中开创新局,如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平安中国和美丽中国等<sup>[16]4-5</sup>,力求切切实实地在现实生活向度真正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和维护人民合法权益。

回到马克思的经典著作中求索现实物质利益问题何以演变为一种“难题”,有助于我们愈加深刻地探明马克思为何遭遇“难题”、何谓“难题”等困惑,以及厘清“难题”及其求解诉求是推动马克思开启自身思想体系建构之路的关

键“促发点”这一前提性的理论认知。此外,马克思求解现实物质利益问题的进程中潜藏着其关于国家治理的事实性描述和规范性分析,梳理总结其中内蕴时代价值的建设性观点,能够为我国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背景下走好国家治理之路提供重要指引。

###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88.
- [2]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3] 吴晓明.形而上学的没落:马克思和费尔巴哈关系的当代解读[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2017:431.
- [4] 徐苗,刘同舫.对理性从坚定到怀疑:《莱茵报》时期马克思遭遇“物质利益难题”的前后[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49(1):20-27.
- [5] 黄学胜.“物质利益难题”:马克思怀疑启蒙的最初理论环节——从国内的一个争论开始说起[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36(2):93-97.
- [6] 炎冰,熊一.利益魔咒下法律正义的虚假本体:重读马克思的《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17(4):7-13,89.
- [7] 周嘉昕.政治经济学批判视域中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J].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20,6(3):24-34.
- [8] 潘中伟.《莱茵报》时期马克思思想转向的内在原因探析:青年马克思难以对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缘由[J].学术研究,2017(6):12-19,40,177.
- [9] 杨学功.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研究读本[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16.
- [10] 段忠桥.《莱茵报》时期使马克思苦恼的“疑问”是什么[J].学术研究,2008(6):32-35,159.
- [11] 孙伯鍈.孙伯鍈哲学文存:第1卷[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93-94.
- [12] 刘荣军.近代市民社会理论的裂变聚变及其思想史效应[J].东南学术,2018(1):47-62.
- [13] 列宁.列宁全集:第2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83.
- [14] 张亮.在转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前夜:《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哲学思想发展的再考察[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4):16-20.
- [15] 习近平.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10-09(02).
- [16] 本书编写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4.

[责任编辑:毛丽娜 聂海杰]



引用格式:徐苗.马克思早期探寻“物质利益难题”之路及其对国家治理实践的启示[J].郑州轻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26(1):1-8.